

論明清時期朝鮮向中國求書的緣由*

吳政緯**

眾所皆知，今日的韓國、日本、越南各地收藏數量驚人的漢籍（中國刊本）。追溯此些國家搜求漢籍的歷程與緣由，不少學者歸諸「慕華」，即搜求漢籍出於外國人仰慕中國／中華文化的心理。慕華確實立足一定的史料基礎，也存在抱持此種想法而收買漢籍的例子。但是東亞各國對待中國的態度，絕非始終如一，而係複雜漫長的變化過程。本文旨在以朝鮮為中心，探究明清時期的朝鮮人何以代代相承，持續搜求漢籍。這股需要漢籍的力量來源可概分為三，一、長時段的因素，如知識養成、人才培育、制度設計、出版環境等；二、偶發性的事件，尤其是戰爭；三、古代東亞各國必須面對的實際需要，即與中國進行外交往來，需要一定的漢學素養。本文結合前述三方面的考察，試圖在慕華之外開闢新的視角，理解朝鮮人搜求漢籍的背景與緣由。

關鍵詞：漢籍、漢學素養、兩班、書籍史、知識史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天朝遺文：近代東亞的書籍環流與歷史書寫」（111-2917-I-002-004）部分成果，2021年曾以〈東亞書籍環流的形成：境外需求的起源與困境〉為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工作坊「亞洲海域的跨界與交流：新史料、新視野」。感謝會議期間，藍弘岳老師、廖肇亨老師、林侑毅老師的批評，以及投稿後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Email: andorealer@gmail.com。

從西元 7 世紀開始，朝鮮半島的新羅、百濟憑藉緊鄰中國大陸的地利之便，不斷輸入漢籍。¹這場搜羅漢籍的行動，雖易代鼎革而不變，倘若自隋唐之世算起，直迄清代晚期，綿延上千年。古代的日本、韓國、琉球、越南等地，收貯許多來自中國的珍本秘笈，已是當代學界的常識。特別是在各國文庫、圖書館出版目錄之後，如《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錄》、《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學者不論是評估漢籍的數量規模，抑或考索版本源流，倚靠俱足。然而相關研究鮮少解釋東亞各國的朝廷、知識人何以數百年如一日地求書，彷彿這是一件不證自明的事實。

倘若未能充分說明這股購書動力的內涵，實際上難以回答外邦人何以願意數百年間不斷地挑戰中國法令。目前的研究成果揭示，傳統中國自宋代開始有意識地防禁書籍輸出國外，直到明清兩代，相關規範不僅編入政典，也曾切實執行。²從這個角度理解漢籍在東亞的流動過程，等同朝鮮、日本方面知法犯法的歷史。揆諸常情，人們普遍不願意違反法令，遑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刻意犯罪。

涉及東亞各國收藏、求買漢籍的相關研究，可概分為三類：版本目錄學、文化交流史，以及漢（文）學史。此類著述的旨趣，通常是確認漢籍越境流動的途徑，勾沉中介者的角色，澄清政治、社會等背景；或是歷時性地討論漢籍輸入與當地漢（文）學素養之間的關係。³

¹ 權惠永（권덕영）著，樓正豪譯，《古代韓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22），頁 272-276。

² 宮崎市定，〈書禁と禁書〉，收入宮崎市定，《アジア史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59），卷 2，頁 232-254；吳政緯，〈明清官方書籍輸出制度研究〉，《文獻》，3（2023），頁 42-72。

³ 相關研究極為豐富，僅舉幾種為例：磯部彰編，《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こはく》（東京：知泉書館，2004）；磯部彰編，《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にわたり》（東京：二玄社，2004）；金程宇，《域外漢籍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磯部彰編，《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ほしづくよ》（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2010）；黃智瑛（황지영），《명칭출판과 조선전파》（과주：시간의물레，2012）；Cynthia Brokaw and Peter Kornicki, eds.,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3); 陳正宏，《東亞漢籍版本學初探》（上海：中西書局，2014）；Joe P. McDermott and Peter Burke, eds., *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 1450-1850: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李南，《朝鮮王朝與明清書籍交流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

相關研究論及朝鮮求書中國的動機，一種極為常見的看法是仰慕中國（華）文化。管見所及，中文世界第一篇專題研究乃李光濤（1897-1984）的〈記東國朝鮮之求書〉（1958）。李氏主張，朝鮮文化受中華影響，而求書一事「不外說明東國的文化反正都是受了中華的影響」，並指出該國上下「一致地都以接受華化為榮」。⁴此番頗具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的持論雖發於 65 年前，卻影響深遠。

晚近如胡春惠（1937-2016）強調，由於朝鮮君臣以小中華自豪，所以費心購求代表中華文明的書籍。⁵季南詮釋明清中國與朝鮮王朝之間的書籍往來，同樣認為朝鮮與中國的書籍交流，「正是在向慕中華文化思想的指導下」進行。⁶顯然他們均支持從「慕華」的角度，理解外國人求書購書的種種事例。

筆者完全承認，古代的朝鮮人、日本人確實曾經存在慕華的現象。15 世紀的朝鮮人便自稱自箕子以來，教化大行，史稱小中華，⁷自比中華即是傾慕的表徵之一。18 世紀的朝鮮燕行使李德懋（1741-1793）也在寫給清朝儒生的信件直言：「所大願，乃學古人、慕中國而已。」⁸日本方面，除禪僧信中以篤（1377-1451）發願入明的事證之外，被視作江戶儒學之祖的藤原惺窩（1561-1619），常慕中華之風，欲見中華文物。惺窩甚至為求聖賢性理之書，思及當世無人能夠指導自己，奮發欲入大明國，可惜遭風遇難失敗。⁹

但是一律從慕華的角度詮釋，似乎存在若干問題。畢竟選擇性地彰顯慕華的面向，不啻忽略東亞各國內部的複雜性。研究者也能夠揀選相反的證

⁴ 李光濤，〈記東國朝鮮之求書（上）〉，《大陸雜誌》，16：10（1958），頁 5。

⁵ 胡春惠，〈從中韓關係史中談漢學之東漸〉，《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8：5（2014），頁 9。

⁶ 季南，〈朝鮮王朝與明清書籍交流研究〉，頁 46。

⁷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成宗三年七月十日乙巳條，頁 4b。本文徵引者，俱出自大韓民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的《朝鮮王朝實錄》資料庫：<https://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擷取日期 2023.5.1。

⁸ 相關研究見山內弘一，〈朴齊家に於ける「北學」慕華意識〉，《上智史學》，43（1998），頁 11-22。山內弘一，〈朝鮮國人李德懋と慕華意識〉，《朝鮮文化研究》，7（2000），頁 25-45。

⁹ 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寬文二年〔1662〕刻本），卷 40，〈惺窩先生行狀〉，頁 4a。

據，提出迥異的結論。事實上晚近的研究，正是強調此間的複雜性，特別是認同中華文化與強化本國意識之間的競爭與對抗。¹⁰

受限於篇幅與旨趣，本文將以朝鮮為中心，不擬深入申論同時期的日本、琉球、越南。筆者關心的是，明清時期的朝鮮人何以長期索求中國刊本（亦稱漢籍），嘗試通過檢視朝鮮內部的制度設計、知識養成、人才培育、出版環境，以及各種天災人禍、國際外交，具體說明此些因素如何形成、推進規模龐大且持續不斷的漢籍需求。深入上述幾個面向的歷程，筆者無意藉此譜寫一部朝鮮漢學史、朝鮮漢文學史，目的是在肯定慕華具有一定解釋效力的立場下，尋求慕華之外的解釋。

眾所周知，中國書籍輸入東國的樞紐是朝鮮赴京使節團。使節團的主要成員如正使、副使、書狀官、子弟軍官，大多是朝鮮的兩班士族。¹¹析論他們的漢學素養與身處的社會背景，牽涉面相甚廣，論證過程除徵引相關研究之外，主要利用朝鮮文集、筆記、日記，以及各種具讀書指引性質的文本，例如朝鮮英祖（1694-1776）的《御製讀書錄》。以下各節，茲先重建一股長期的穩定力量，即對於朝鮮人而言，如何區分知識的輕重與先後；再推究戰爭如何影響朝鮮方面搜求書籍。最後分析朝鮮與中國的外交往來如何產生漢籍需求。因為外交的部分不是朝鮮獨有的現象，遂綜論日本、琉球的情況，一併討論。凡此述論，以求明晰朝鮮搜求漢籍的背景與緣由。

¹⁰ 相關研究請參閱：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藤井倫明，〈日本山崎闇齋學派的「中國／華夷」論探析〉，《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3（2015），頁193-230；朱莉麗，《明日交涉與日本對華觀的流變》（濟南：齊魯書社，2021）；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修訂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向卿，《江戶時代日本人身份建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頁105-288。

¹¹ 林麻衣子，〈李氏朝鮮王朝における對外使節の出自について〉，《史泉》，89（1999），頁16-24；漆永祥，〈朝鮮燕行使團中的正使、副使與書狀官研究〉，《中國文化》，56（2022），頁203-223；漆永祥，〈朝鮮朝燕行使團中的譯官軍官與帶率子弟等研究〉，《東疆學刊》，40：1（2023），頁1-20。

一、朝鮮統治者的知識世界

本節的旨趣係重建朝鮮統治者的知識秩序，所謂統治者包含朝鮮王室、兩班世族以及一般士人。「知識秩序」是一個社會排序知識的標準，重視什麼、輕視什麼，主要的知識來源為何。¹²這個知識觀創造龐大的漢籍需求，其中以經史為重，史學也備受關注。朝鮮研習漢學的方式，確實受到中國的影響，但是這並不單純因其仰慕中華的心態，而係因為傳統中國在教育方面的早熟，以及朝鮮讀書人以儒典史籍為業，自然援引中國之道。對於任何制度的後進者而言，「模仿」是早期發展階段成本最低、效果極佳的選項。更重要的是通觀近代早期朝鮮人的漢學訓練，他們學習的最終目標頗為一致，實與慕華無關。

（一）朝鮮的經筵日講

乾隆二十一年（1756），朝鮮英祖在昌慶宮崇文堂召集弘文館群臣，舉行經筵日講（包含朝講、晝講、夕講、夜對、召對）。經筵是官員為帝王講經論史的御前活動，漢代首開其端，至宋代始有經筵之名。在傳統中國，經筵官例由翰林學士或清要貴重的文臣充任，而弘文館正是栽培朝鮮王朝未來宰執的搖籃。此次經筵，副應教元仁孫（字子靜，1721-1774）、副修撰洪準海（字孝直，1715-1771）等六人入侍臨御，英祖命元仁孫、洪準海讀起《御製自省編》。該書出版於1746年，記載英祖自省所得，分為內外兩篇，內篇記自修之事，外篇載為治之方。

元仁孫、洪準海讀畢《御製自省編》幾個段落後，英祖向弘文館諸臣詢問一連串的史事。此次君臣問答主要圍繞著《宋史》、《明史》展開，篇幅頗長，約2,900餘字，其中一段云：

仁孫曰：「崇獎氣節，國之大政。大明之末，有遺民不仕者，徐方〔枋〕是也。仍達之本末。」上曰：「在何書？」仁孫曰：「《居易堂》，即姜

¹² 關於知識秩序（Orders of knowledge）的討論，請參 Peter Burke,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pp. 25-28.

文石文集，而李彝章赴燕時得來，方在玉堂矣。」上曰：「李顯重以為呂留良非有節義，不欲薙髮，故如彼云矣。其言如何？」仁孫誦呂留良詩數句曰：「此復讐之言也。」上曰：「錢謙益何如？」仁孫曰：「《明史》云出降矣。」上曰：「儒臣必熟《明史》矣。《宋史》則書帝顯以下，《明史》則不書弘光以下，何也？」仁孫曰：「彼人書弘光以下事，名曰《三藩紀事》矣。」¹³

首先須注意到，英祖君臣探討的議題是中國歷史，非朝鮮歷史。經筵日講涉及歷史議題時，為確認史實，自然重視典故出處，而這場在朝鮮宮廷上演的知識活動，幾乎不需要朝鮮書籍，整個過程須與不離的是漢籍。¹⁴論對過程中提及的圖書，事實上除卻《御製自省編》，仰賴的是透過燕行使如李彝章（1708-1764）買來者，書目如表 1 所示。

表 1 朝鮮英祖經筵日講時論及書目

居易堂集	明史	宋史	三藩紀事
明紀編年	明季遺聞	啓禎野乘	曝書亭集
禮記	明興雜記	魏禧文集	資治通鑑

資料來源：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69），冊 62，頁 861-862。

其次是經筵日講的頻率。根據統計，英祖在位 51 年 7 個月間，舉行經筵 1,341 次。僅僅英祖四十六年（1770）間便高達 119 次，等於每三天一次。¹⁵英祖是朝鮮王朝史上的名君，熱衷學問，與有「讀書大王」之稱的乃孫正祖（1752-1800），開創英正時期的治世。然而他們的突出表現實有跡可循，畢竟朝鮮王朝具備優良的經筵傳統。1392 年 8 月，朝鮮代高麗而立，僅一閱月，

¹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69），冊 62，英祖三十二年一月十七日，頁 861-862。

¹⁴ 李光濤關於朝鮮成宗經筵的研究，指出朝鮮君臣對中國書冊的琢磨程度，相關史料若不標明朝鮮、某某王朝等字樣，一般讀者很難以此為朝鮮史籍。見李光濤，《中韓民族與文化》（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8），頁 214。

¹⁵ 金重權（김중권），〈朝鮮朝經筵에서 英祖의 讀書歷 考察〉，《書誌學研究》，79（2019），頁 56。

太祖李成桂（1335-1408）命大司成劉敬講《大學衍義》。明宗（1534-1567）在位 22 年，時間未及英祖之半，經筵卻達 2,129 次。¹⁶

源自中國的思想資源是朝鮮君臣的重要借鑒，朝鮮國王任內動輒千次的經筵活動，具體揭示朝鮮官方對漢籍的長期需求。例如英祖命臣子纂輯的《御製自省編》，目的是總結他鑽研史書得來的治平之方，頒諸士人參考。該書分為內外兩篇，內篇是英祖閱讀儒家經典的心得，外篇則是翻覽史冊的自省之語。外篇計 110 條，¹⁷除 20 條記述不明確，難以判斷，餘 90 條都是閱讀中國史書的感想。儘管英祖斥責道：「我國之人於中朝歷代事該括，而於東史昧焉。」他何嘗不是自己口中「能見牆外，而不見牆內」的漢學精英。¹⁸

英祖又有《御製讀書錄》傳示正祖，¹⁹自述幼時至 72 歲的讀書經歷。他 8 歲始讀《孝經》，10 歲讀《童蒙先習》，13 歲讀《小學》，直到 65 歲以後，輪講《大學》、《中庸》已各 8 次，堪稱勤學典範。總計英祖的讀書書目如表 2 所示。

表 2 朝鮮英祖自述讀書經歷表

大學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小學
中庸	心經	左傳	朱子封事
孝經	宋子語類抄	宋元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
宋鑑	李忠定公奏議	周禮	孟子
明紀編年	東國通鑑	春秋	皇明通紀
貞觀政要	唐鑑	書傳	陸宣公奏議
童蒙先習	節酌通編	聖學輯要	詩傳
資治通鑑	歷代名臣奏議	歷代君鑑	禮記抄

¹⁶ 金重權，〈朝鮮朝 經筵에서 明宗의 讀書歷 考察〉，《書誌學研究》，49（2011），頁 77-109。

¹⁷ 筆者據以統計的《御製自省編》版本為首爾大學校奎章閣編，《英祖御製訓書》（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03），冊 1。

¹⁸ 朝鮮英祖，《御製自省編·外篇》，收入首爾大學校奎章閣編，《英祖御製訓書》，冊 1，頁 412。

¹⁹ 朝鮮英祖，《御製讀書錄》，收入首爾大學校奎章閣編，《英祖御製訓書》，冊 4，頁 87-115。

麗史提綱	
------	--

資料來源：朝鮮英祖，《御製讀書錄》，收入首爾大學校奎章閣編，《英祖御製訓書》（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03），冊4，頁87-115。

姑且不論卷秩多寡與經筵次數，此33種書中，5種為朝鮮本（方框表示），餘皆漢籍，佔據壓倒性的地位。英祖的省語與自述之所以值得重視，在於他明確地傳達，當時理想的讀書人與統治者的樣貌，以及一條透過漢籍陶冶身心、汲取政治經驗的道路。這個體制的建立，除了要求朝鮮國王的熱心參與，文臣平日的學習與磨練更是不可或缺。在這個「頂點」（朝鮮宮廷）之下，以官方、私家教育體系為中心，無數朝鮮讀書人擠身向上，前仆後繼。

（二）讀書次第

朝鮮王朝的官方學校，名為成均館，始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朝鮮史上，成均館數次遭遇祝融，皆得到政府支援，屢次重建。該校訂定「學令」，責令學員一體遵從，細至每月每日的行事。²⁰天順二年（1458），朝鮮官方又頒布「九齋學規」，將學習四書五經的過程分為九個階段，安排自《大學》以降，乃至《周易》的讀書次第，以及相應的考試辦法。²¹儘管學規因時更迭，不過申明學員「常讀四書五經及諸史等書，不挾莊老、佛經、雜流、百家子集等書，違者罰」，蓋其一貫立場。²²

永樂二年（1411），朝鮮官方在漢城設立四所公立學校，名為四學。漢城之外各地方則自建國之初便命令興學，是作鄉學。規模容或不同，學習內容一致是圍繞小學、四書、五經，配合《近思錄》與中國歷代正史。值得一提的是朝鮮的雜科，即中人階層參與的科舉，如譯科、醫科、律科、陰陽科，

²⁰ 韓基彥（한기연）著，井上義巳譯，《韓國教育史》（東京：広池学園出版部，1965），頁93。

²¹ 韓基彥，《韓國教育史》，頁143。

²² 韓基彥，《韓國教育史》，頁93。

側重技術性的知識。雜科考試的內容大多出自漢籍，如醫科的《直指方》、《婦人大全》，陰陽科的《大明曆》、《太陰外篇》。²³

朝鮮士人時有訓兒、示兒之作，或釐正士節規範的文章。此類文字堆疊起朝鮮讀書人引以自豪的漢學素養，也耗費數個世代支付難以想像的成本。畢竟他們是不通漢語口說的外邦人，文言分離的國情卻一樣要求平仄押韻，吟詩作對，乃至撰寫表文國書。

綜合此類作品，儘管間有差異，主軸不外乎先經後史。趙翼（1579-1655）在 32 歲時反省讀書甚少，學無所得，自勉此後須絕意他書，致力「讀聖賢之書，先讀《小學》、《近思》、《節要》等書，次及於《四書》，次及於《五經》，次及於史學，循序致精」。²⁴經學優先是眾所公認的原則，鮮于浹（1588-1653）的〈初學讀書次第〉云，先讀《小學》以立其骨子，次讀《大學》以定其規模，繼而《論語》、《孟子》、《中庸》，立其根本，以見古人之微妙。²⁵李植（1584-1647）的〈示兒孫等〉教誨後人先讀《詩經》、《尚書》、《論語》、《孟子》，次讀《周易》、《春秋》、《禮記》諸書，進而旁考歷代史書、東國史及文集等，²⁶訓練王儲的方法與兩班士人並無二致。²⁷

這條培育士人學習儒家經典的道路，貫穿他們自幼及長，從在野到出仕的生命史。朝鮮孩童的入學年歲介於 8-16 歲之間，²⁸不過普遍於 7-8 歲開始，一同中國。他們日日背誦儒典、中國史書，精讀的程度甚至達到每段背誦一百遍，隔日確認昨日記憶無誤，方可繼續下一段。²⁹倘若不能循此前進，例如幼時無法詳記天干地支的規律，掌握家族源流與中國歷代國號，或

²³ 韓基彥，《韓國教育史》，頁 121-122。

²⁴ [清]趙翼，《浦渚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卷 20，〈雜著・書攻書日錄〉，頁 358。

²⁵ 鮮于浹，《遜菴全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卷 1，〈心學至要・初學讀書次第〉，頁 8。

²⁶ 李植，《澤堂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卷 14，〈雜著・示兒孫等〉，頁 513-514。

²⁷ 關於朝鮮讀書人古典訓練的研讀書目及其研究，請參閱康吉秀（강길수），〈朝鮮時代의 教育古典〉，收入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教育研究室編，《韓國의 教育古典研究》（城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3），頁 79-130。

²⁸ 韓基彥，《韓國教育史》，頁 146。

²⁹ 韓基彥，《韓國教育史》，頁 132。

熟知《十三經》、《二十二史》，是不足為人也。³⁰黃德吉（1750-1827）曾用圖解的方式，呈現整個體系的樣貌，請見圖 1。



圖 1 黃德吉「讀書次第圖」

資料來源：黃德吉，《下廬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卷 8，〈雜著・讀書次第圖並說〉，頁 412。

按照此先讀、次讀、兼看的順序研修經典，則近道矣。或許令今人多少感到違和的是，這套排除異端，主張「非聖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的知識體系不太需要朝鮮書籍。³¹黃德吉〈讀書次第圖〉唯一提到出於朝鮮人之手的作品是「東國諸史」，且排序在中國歷代正史之後。朝鮮末期的士人李沂（1848-

³⁰ 李德懋云：「幼時不能詳記六甲、九九、世系、國號諸名數，則到長益鹵莽。至有不能辨臟腑之名，五穀之次及經史之篇目者，是不足為人也。」見李德懋，《青莊館全書》（首爾：首爾大學校古典刊行會，1966），中冊，卷 31，〈童規〉，頁 425。

³¹ 柳馨遠云：「讀書先讀《小學》，培其根本，次讀《大學》，定其規模，次讀《論》、《孟》、《中庸》、《近思錄》、《六經》，間以《史記》及先賢性理之書，以盡精微，以鑑得失。凡經傳須循環理會，以期自得，非聖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見柳馨遠，《礪溪隨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58），卷 9，〈教選之制・學規〉，頁 171。

1909)，身處日本帝國侵擾半島的變局中，深切反省過往的教育缺乏朝鮮主體性，自承：

愚雖不敏，顧其才性，亦非駑下。七歲從鄉先生受《千字文》，既已受《童蒙先習》，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句雖能讀，實不解親義之意果安在也。數月後又受《通鑑節要》，九歲而畢，只知有中國，不知有我韓。其治難興亡，皆與吾無涉。³²

儘管經書養人德性，史傳益人才智，³³然令朝鮮士人皓首窮盡的經史卻皆傳自中國。李沂此番告白，說明朝鮮古典教育體系之牢固與久遠。在「只知有中國，不知有我韓」的國度中，漢籍幾乎等同唯一的知識。

（三）實際需求

朝鮮知識階層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的精英訓練，產生龐大的漢籍需求。此外，朝鮮官方基於擬定對中國政策，以及各種統治需要，同樣必須掌握充足的漢籍，作為理解、判斷外交事態的參照。正統四年（1439），朝鮮官方欲知大明官制，囑咐聖節使李思儉（?-1446）赴京後凡干禮樂制度諸書，廣求而來。³⁴嘉靖二十一年（1542），禮曹判書金安國（1478-1543）提請刊印書籍二十種，全為漢籍，他強調《山海關志》能知關隘、形勢、山川、道里，《大明律讀法》則為用律時參考甚要。³⁵

雍正十三年（1735），驪善君李壘（生卒不詳）以冬至正使赴燕，歸國後啟言朝鮮不可不知清朝的八旗制度，然在當時「其設置規模，無以詳知」。幸賴使節團中的軍官金裕門、譯官卞重和捐出私財，買來《八旗官爵》、《中樞備覽》、《八旗上諭》，八旗制度皆在其中，朝廷始有所憑恃。³⁶

³² 李沂，《海鶴遺書》（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74），卷3，〈一斧劈破論〉，頁79。

³³ 李晔光，《芝峰類說》（柏克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二年〔1614〕序刊本），卷5，〈儒道部·學問〉，頁1a。

³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二十一年九月三日戊申條，頁24a-b。

³⁵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中宗三十七年五月七日丁亥條，頁20a-b。

³⁶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冊10，英祖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頁646。本文所徵引者，俱出自大韓民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的韓國史資料庫：<https://db.history.go.kr/>，擷取日期2023.5.8。

朝鮮王朝的制度建設大量吸收中國經驗，朝鮮正祖曾無奈地表示：「徵文獻，考典禮之道，不得不資於中國。」³⁷絲毫沒有浸淫漢文化的欣喜之情，惟有「不得不」如此的無奈，反映朝廷各種業務的實際需求。例如儀禮典制，宗親上朝的班序須稽諸《文獻通考》，³⁸先王喪畢後如何舉行宗廟秋享大祭則參考《禮記》。³⁹禮制一從中國的結果，⁴⁰政府各部門不時陷入書籍不足徵的窘境，如禮曹以《杜氏通典》、《文獻通考》甚切於儀文考閱，疏言朝廷，責命朝鮮使節團從便求買歸國。⁴¹

天文、地理、醫學在朝鮮並稱三學，究其根柢，一同中國。直到 1791 年，朝鮮立國近四百年，觀象監仍直言治曆之學專資中國方書儀器。⁴²治療患疾的醫業是定人生死的命科，必須遍觀諸方，參考同異，但書冊稀少。1456 年，典醫監姜孟卿（1410-1461）焦急道「習讀官十五人，共看數冊，自然研讀未能專精，遑論以時溫繹」，而問題終究在於「唐本方書未易多得」。⁴³八年後（1463）情況並未改善，「內藏醫書或不秩，或脫落，或字刊，難於考閱」。⁴⁴觀諸此類廟堂之上的公開建言，除少部分官員提議頒布徵集書籍之令，絕大多數的主張皆為責令朝鮮使節團購回。成功購回者通常能夠領受朝廷的賞賜，對於部分朝鮮人而言，獎勵才是推進朝鮮人購書的力量。⁴⁵

朝鮮的知識秩序，顯然存在一個受中國影響的旋律，不論是及身而止的

³⁷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冊 16，正祖十年三月三日，頁 638。

³⁸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己酉條，35b-36a。

³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六年三月一日丁丑條，25b-26a。

⁴⁰ 朝鮮中宗曾言「禮制之事，當一從中國」。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中宗三十九年四月四日壬申，頁 50a。

⁴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仁祖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癸卯條，頁 33a。

⁴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戊辰條，頁 50a-51a。

⁴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祖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癸亥條，頁 5a。

⁴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祖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甲寅條，頁 19b。

⁴⁵ 例如黃梓（1689-?）的《甲寅燕行錄》載：「安重泰來言，買得曆法必有譯官居間，然後可為，而自前論賞止於一人矣。今行高時彥專管此事，趙仁璧初欲併力為之，自知賞不兩及而止之矣。」請見黃梓（황재）撰，신로사譯，《국역 갑인연행록》（首爾：세종대왕기념사업회，2015），頁 75。這套由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出版的「燕行錄國譯叢書」（연행록국역총서）收入數種不見於《燕行錄全集》、《燕行錄續集》等叢書的史料，每本書的前部為解題、翻譯，後部附上原文，或直接影照，或打字排版。本文所徵引者，皆為後部的史料原文，以下同。

學問，抑或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如三學所業之書，非朝鮮所創，長期仰賴中原新刊，於是三學官員，或差從事官，或差打角夫，每年一人參與朝鮮使節團，貿三學之書。⁴⁶1541年，朝鮮中宗（1488-1544）命金安國（1478-1543）擬定一份購買漢籍的清單。金安國考量到此次預定通過朝鮮、明朝之間的官方管道求書，表示既是移咨大明禮部，當以經學理書為主，卻也強調必須抄入雜書、醫藥、卜筮、天文、地理等書目。⁴⁷

（四）漢籍與坊刻本

既然朝鮮官方已經如此缺乏漢籍，民間所得自是加倍珍稀。朝鮮中期的著名文臣柳希春（1513-1577）在傳諸子孫的庭訓中，提醒「凡披閱書冊，當慎拈張。熟溫時，不可置穢」。⁴⁸若遇人求借藏書，苟非情親愛護書冊之人，不可見借。父祖用功之書，尤不可出。⁴⁹李德懋（1741-1793）亦云，看書勿以爪劃行，勿以汗手承而讀之，連續以「勿」字開頭，警示 15 種不宜的讀書習慣，⁵⁰用心呵護書冊。如此珍視，肇因朝鮮不存在同時期中國、日本的坊刻業。對於朝鮮讀書人而言，赴燕貿得的漢籍方是主流，其次才是朝廷的宣賜本，以及兩班家門刊刻的出版品，捨此無他。無怪乎李德懋表示：「中國書籍

⁴⁶ 朝鮮中宗云：「天文、地理、命科〔課〕，雖非重事，然天文則似為最緊。三學設立之意，豈偶然哉？且三學所業之書，非我國所創為也，出自中原，其來久矣。近來所業不精，甚為不可。中原豈無精撰新書乎？三學官員，或差從事官，或差打角夫，令赴京使臣，每年一人，次次帶行，則庶可貿三學之書矣。」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中宗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辛卯條，頁 37b。

⁴⁷ 兵曹判書金安國云：「前日命小臣，中朝可貿書冊，抄考書啓，故臣以藏書閣東西文武樓書冊，憑考歷代書冊，則我國所無者甚多，故歷代書冊，多抄啓。然不能一時盡貿，每行次，價物量給，隨所見貿來為當。於禮部移咨請貿則當以經學、理書為主，故多抄實學也。諸子百家，不能盡抄，故只抄名家。且雜書、醫藥、卜筮、天文、地理，亦不可不抄，故名錄若是其多也。」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中宗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庚辰條，頁 5a-b。

⁴⁸ 柳希春，《眉巖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卷 4，〈庭訓內篇〉，頁 212。

⁴⁹ 柳希春，《眉巖集》，卷 4，〈庭訓外篇〉，頁 216。

⁵⁰ 李德懋云：「看書。勿涎指揭葉，勿以爪劃行，勿摺葉以標方看，勿捲書腦，勿揉書面，勿以汗手承而讀之，勿枕書，勿以肘憑書，勿以書覆酒缸，勿開書於掃塵處，勿看書引睡、墮摺於肩股間，勿擲書，勿以挑燈搔首之指翻葉，勿用力猛翻葉，勿揮撲窓壁以拂塵也。」見李德懋，《青莊館全書》，中冊，卷 27，〈士小節·上〉，頁 367。

之稍稀貴者，除非文士入燕親購，則元無可得之理。」⁵¹燕行使金壽興(1626-1690)亦云：「中華舊物、儀章、書籍，實有願見而不得者，欲一廣求於燕肆。」⁵²由此可見一斑。

1787年，朝鮮正祖不無誇大地指陳：「我國人家溢宇充棟者，無非唐本。」⁵³此處的「人家」自非家家戶戶，而係兩班世家大族。⁵⁴唐本則無疑是在中國刊刻的漢籍。朝鮮官方其實擁有優異的活字技術，民間亦不乏讀書世家，卻在19世紀之前皆不存在坊刻業，其中關鍵在於：一是朝鮮王朝的身分制度，二是經濟、物質條件上的限制。

朝鮮王朝的身分體制，原則是區別「良賤」，非良則賤，一賤則賤。今人習稱的「兩班」發端於高麗時代(918-1392)，固定於朝鮮前期。至於中人則在朝鮮前期萌芽茁壯，確立於朝鮮後期。⁵⁵朝鮮時代的兩班，脫離高麗時代的定義，不再指稱單純的官員。要成為眾所公認的朝鮮兩班世家，除需要顯耀的先人，尚須在科宦、學習、科舉等方面歷有成績，或四祖(父、祖、曾祖、外祖)曾經入仕任官。雖然朝鮮兩班與明清的士人同樣須得到科舉的肯定，然而朝鮮人民難以具備同樣的養成條件——鎮日讀書，廢其勞動。

朝鮮的科舉等同是在既得利益者之間重新分配。朝鮮王朝500年間，約15,000人文科及第，以家門為單位，如全州李氏、安東權氏等，文科及第超過300名以上的世家大族便有5個，佔總量15%。若加上文科及第超過100

⁵¹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上冊，卷19，〈金直齋〉，頁253。

⁵² 金壽興，《退憂堂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4)，卷9，〈上尤齋〉，頁167。

⁵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冊16，正祖十一年十月十日，頁983。

⁵⁴ 韓國學者姜明官(강명관)曾經指出，朝鮮社會從18、19世紀開始出現藏書家，尤以首爾地區的京華世族為著。京華世族能夠維持藏書，需要經濟、文化基礎，以及維持家門的能力，實非升斗小民可比擬。見姜明官，〈조선후기 서적 수입·유통과 장서가의 출현〉，《민족문화사연구》，9(1996)，頁171-194。

⁵⁵ 宮嶋博史，〈朝鮮兩班社會の形成〉，收入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宮嶋博史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冊4，頁131-164；蔡茂松，《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臺北：東大圖書，1995)，頁174-194。李成茂(이성우)著，楊秀芝譯，《朝鮮初期兩班研究》(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96)；李成茂，〈朝鮮時代的身分結構與特徵〉，收入朝鮮社會研究會編，《朝鮮王朝面面觀》(臺北：永望文化，2019)，頁73-78；李成茂，〈朝鮮時代的兩班文化〉，收入朝鮮社會研究會編，《朝鮮王朝面面觀》，頁149-156。

名的家門，如潘南朴氏、大丘徐氏等，共達半數之多，稱為寡占亦不為過。⁵⁶加上朝鮮不定時頻開恩科，外地士子無法驟至，導致在京兩班的地位日益穩固。通觀朝鮮史上的學者，僅有金時鐸（1713-1751）係商人出身，可見一斑。⁵⁷當然隨著兩班人數的膨脹，鑑別兩班身分與否亦日趨嚴格，凡此均不利於階級流動。

朝鮮官方不可能同意設立書肆，因為兩班士人從維繫自身地位的角度思考，必然強力反對，豈能簡單放棄獨佔為學之道的資材——書籍。⁵⁸回顧朝鮮王朝史，中宗、明宗均曾在朝堂上與臣子討論官營書店之事。1519年，事事樂於效法中國的官員推託道：「書肆則甚美矣，然我國非如中國，為之亦難。」⁵⁹1538年，中宗又感嘆朝鮮未有書肆，儒者不能皆有其書，甚至欲借觀而不可得，亦或有因此而廢業者，京外皆然。⁶⁰可惜皆無下文。明宗即位後第六年（1551），亦興起設立書肆的念頭，此次司憲府直接反對，明言迄今「數數收議，似為煩瀆。書肆申明之事，請勿留難」，⁶¹終究胎死腹中。

朝鮮時代坊刻業發展遲緩的第二個原因是受限於經濟（包含經濟勞動）、物質條件。朝鮮的經濟狀況不比明清中國、江戶日本，首先商業規模本就較小，更重要的是兩班士人拒絕加入民間出版市場，導致坊刻不僅紙質粗惡，且校對不精。在同時代的中國與日本，不乏讀書人從商治生的故事，然而兩班

⁵⁶ 岸本美緒、宮嶋博史，《明清と李朝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頁101-105。

⁵⁷ 藤本幸夫編，《書物・印刷・本屋》，頁8。

⁵⁸ 鄭亨愚（정형우），〈書肆에 대한 몇 가지 問題〉，收入斗筆鄭亨愚博士定年紀念論文集刊行委員會編，《朝鮮朝書籍文化研究》（首爾：九美貿易株式會社出版部，1995），頁399；姜明官（강명관），《조선시대 책과 지식의 역사》（首爾：천년의상상，2014），頁336。

⁵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冊15，中宗十四年六月九日辛未條，頁19b。

⁶⁰ 朝鮮中宗云：「中原則有書肆，故閭閻之中欲學者，求無不獲，我國則未有書肆，故為儒者，亦不能皆有其書，欲借觀而不可得，則亦或有因此而廢業者。是弊，京外皆然也。」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中宗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甲申條，20b-21a。

⁶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明宗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甲寅條，頁52b。

教養重視道德修養，萬不可逐利，即便從商也得由奴婢出面。⁶²士大夫遠離民間出版業，平民多半務農，又缺乏商工業出資參與，坊刻業自然難產。⁶³

坊刻本誕生前，朝鮮曾經出現個人性的商業出版品。目前確知的是 1554 年魚叔權編纂付梓的《攷事撮要》。該書有金屬活字、木活字、刻本等版本，在萬曆四年（1576）刻本的刊記，留下「河漢水家刻板買者尋來」的廣告，是為明證。遺憾的是，緊接而來的壬辰戰爭、丙子胡亂，幾近摧毀朝鮮出版業，直到 18 世紀才緩慢復甦。延世大學的李胤錫指出，朝鮮在 18 世紀後半出現兩條關於「貰冊」（租書店）的記述，即蔡濟恭（1720-1799）的《女四書》與李德懋的《士小節》。兩段文字均教誨女性不可棄置女紅、家務，或賣釵釧，或求債銅，爭相貰來諺文小說，以消永日。⁶⁴

事實上這也是朝鮮時代唯二談及民間出版業的史料。從《女四書》、《士小節》提供的線索，以及現今留存的朝鮮古籍判斷，坊刻本的主力是諺文小說，其次為科舉參考書，不涉入漢籍。坊刻與漢籍宛若兩個不重疊的平行宇宙，若檢索韓國古典翻譯院建置的資料庫，鍵入朝鮮後期最具人氣的坊刻本《春香傳》、《簡牘精要》的書名，無法查得任何結果，顯見兩班菁英的生活與此無關，或認為沒有留下文字紀錄的價值。⁶⁵

對於兩班的知識世界而言，官刻本、家刻本方為主角，又以官刻銅活字最為精良。1403-1791 年，朝鮮官方 29 次籌集銅鐵，鑄造活字，或從北京買來木活字。⁶⁶仰仗此等精心冶煉的銅活字，朝鮮官刻本素以品質精良聞名。問題是朝鮮半島罕見銅產，⁶⁷而朝鮮官方原本掌握穩定且豐富的銅源，卻自 1510 年代遭遇一大變局。

⁶² 李成茂，〈朝鮮時代的兩班文化〉，頁 152。

⁶³ 藤本幸夫，〈朝鮮坊刻攷〉，收入藤本幸夫編，《書物・印刷・本屋》，頁 807-836。

⁶⁴ 李胤錫（이윤석），《조선시대 상업출판：서민의 독서, 지식과 오락의 대중화》（首爾：민속원，2016），頁 51-60。

⁶⁵ 李胤錫，〈朝鮮朝出版における坊刻本の性格と位置〉，收入藤本幸夫編，《書物・印刷・本屋》，頁 847。

⁶⁶ 沈慶昊（심경호），〈韓國における近世以前の出版文化と中国書籍の刊行方法〉，收入宮内庁書陵部蔵漢籍研究会編，《図書寮漢籍叢考》（東京：汲古書院，2018），頁 292-299。

⁶⁷ 《萬機要覽・財用編》載：「我國罕銅產，不便於用錢。」見徐榮輔、沈象奎編，《萬機要覽・財用編》（京城：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37），〈錢貨〉，頁 463。

早在朝鮮建國以前，高麗恭讓王（1345-1394）秉政期間，官員便曾明白表示銀銅非本國所產。⁶⁸及威化島回軍，東國朝鮮初立，政府為燒鑄銅錢，不惜徵用百姓與寺社的銅器，甚至觸犯國法者得以納銅贖罪，可見艱苦之狀。朝鮮官方也考慮過開山煉銅。1424年，朝鮮政府在龍潭、金沙邑橋、昌原北背洞三地，共發動50名鄉役軍人，總計費時35日，僅得銅87兩。入山鼓火鑄銅，費時多而所得少。

所幸自世宗年間以降，數量驚人的日本銅輸往朝鮮，填補不足。當是時，室町幕府、九州大名，以及假冒日方代表的偽使，藉著進獻的名義，船載日本赤銅叩關釜山。日本銅輸入朝鮮的規模之鉅，令慶尚道觀察使李克墩（1435-1503）表示銅儲備充足，反而販售日方的棉布不足。然而自1510年代以降，日本當時的主要銅產地如備前、備中、但馬、美作等地，往返北九州的航路受阻，加上三浦之亂（1510）後，日朝貿易逐漸集中於對馬宗家，排除偽使日商，流入朝鮮的銅數自是不如以往。⁶⁹無怪乎朝鮮肅宗（1661-1720）明白表示，「錢文實是一國通貨，不可不繼鑄，而銅非我國所產。」⁷⁰僅倚靠國內的銅產量鑄造銅錢，根本不足以支撐經濟發展。朝鮮官方為解決銅錢問題，尋思的不是增加產能，而係討論是否購入清錢以濟民用，此外便是繼續想方設法，從日本輸入銅料。最終國內本無銅產的現況，加上遠市日本的解決方案，⁷¹是以「公私所需，全用倭銅」。⁷²

然而銅礦既不自產，幾乎憑恃國外輸入，只稍來源不穩，結果便是迎來

⁶⁸ 孫曉主編，《高麗史標點校勘本》（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冊6，卷79，〈志33·食貨二〉，頁2523。

⁶⁹ 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6），頁154-177。

⁷⁰ 朝鮮正祖命編《度支志》（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05），中冊，外篇卷8，頁171。

⁷¹ 洪良浩云：「假使國有銅穴，生出不竭，用物之道，不宜如是。況本無土產，遠市於日本，而倭人夸詐，輒售重直，其所從來，可謂貴且艱矣，國俗顧不知重焉。」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正祖七年七月十八日丁未條，頁23b。

⁷² 徐榮輔、沈象奎編，《萬機要覽·財用編》，〈金銀銅鉛〉，頁478。相關研究請參閱：元裕漢（원유한），《朝鮮後期貨幣史研究》（首爾：韓國研究院，1975），頁33-64；王元周，〈朝鮮的清錢通用與革罷——宗藩體制下市場的整體性及其局限〉，《南國學術》，10：1（2020），頁34-47。

銅荒與錢荒。⁷³1792年，時任平安道觀察使的洪良浩（1724-1802）上疏道，倭銅價高，錢荒日甚，致使譯官失業。⁷⁴朝鮮官方也曾思考對策，如1780年代討論在安邊採銅，然因種種理由而令行禁止。⁷⁵1820年代後期，朝鮮積極開發甲山銅礦，才一定程度解決銅料問題，但對日本銅的需求仍不可忽視。⁷⁶

1613年，朝鮮、對馬藩約定公貿易時，朝鮮指定銅料為必要輸入品。根據《增正交鄰志》的數據，朝鮮每年透過對馬獲得27,900斤的銅料。這固然是解決銅荒的辦法，卻也導致銅料受制於人，尤其日本正德年間開始管制貨幣金屬出境，朝鮮等同束手無策。⁷⁷明乎此，朝鮮鑄銅活字堪稱不惜重本，又特設校書館總領其事，官刻本自然內外皆精，惟僅賜予官員，李熊徵（1658-1713）所言「東方無書肆，板刻亦不廣，故藏書之路甚狹」，⁷⁸此之謂也。

綜合朝鮮的知識結構、身分制度、經濟條件，以及各種限制，如銅礦不足，開採技術尚無法克服困難。朝鮮統治者與讀書人收攏漢籍的康莊大道直指中國，否則無法消化境內龐大的需求。金榮鎮注意到，朝鮮時代著名的藏書家通常能追溯出祖上的燕行經驗，⁷⁹如朝鮮官員申靖夏（1681-1716）自承，「余

⁷³ 島田竜登，〈近世日本の銅輸出削減と朝鮮の錢荒〉，收入川勝平太編，《アジア太平洋經濟圈史：1500-2000》（東京：藤原書店，2003），頁27-46。

⁷⁴ 洪良浩云：「第以倭銅價高，鼓鑄費多，故錢荒比甚。銀產又縮，以致商譯之失業。」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十六年十月十九日甲申條，頁18a。

⁷⁵ 李碩崙（이석륜）著，藤田幸雄譯，《韓國貨幣金融史》（東京：白桃書房，2000），頁103-104。

⁷⁶ 朴讚美（박찬미），〈17-18世紀朝鮮建立銅錢制度之研究〉，《史耘》，19（2021），頁81-136。

⁷⁷ 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頁349-382。

⁷⁸ 轉引自金榮鎮（김영진），〈19世紀朝、清文士之間的書籍受贈及對出版文化的影響〉，收入大韓民國教育部、韓國研究財團、中國社會科學院編，《제1회 한·중 인문학포럼 발표자료집》（대전：한국연구재단，2015），頁89。

⁷⁹ 金榮鎮，〈18세기말 서울의 명칭서적 유통 실태——『欽英』을 중심으로〉，收入이화여자대학교한국문화연구원編，《2004년 한국문화연구원학술대회 17·18세기 동아시아의 독서문화와 문화변동》（首爾：이화여자대학교한국문화연구원，2004），頁99-119；金榮鎮，〈조선후기 중국 사행과 서책 문화〉，收入金泰俊（김태준）編，《연행의 사회사》（首爾：경기문화재단，2005），頁237-290。金榮鎮，〈조선후기 서적 출판과 유통에 관한 일고찰——『欽英』과 『頤齋亂藁』를 중심으로——〉，《동양한문학연구》，30（2010），頁5-28。此外，黃智瑛編有15-18世紀朝鮮藏書家目錄，註明其是否曾經燕行，可資參考，見黃智瑛，《명칭출판과 조선전과》，附錄1-4「조선 장서가 목록」，頁295-309。

家本罕有書籍，先大夫治舉業時，每患借人」，及至燕行，「前後以百餘種購歸」，藏書始豐。⁸⁰至於購書理由，則如乾隆十六年（1751）冬至副使黃梓云：「中州文獻非書籍則何以徵信，是以先輩於書冊不嫌貿來，苟有蓋於斯文者，雖涉於當禁，必周旋取來，此可以見其衛道之心也。」⁸¹外交慣例與知識世界的疊合，創造朝鮮使者在中國訪書的契機與動力。他們經年累月地從北京購回漢籍，憑此培養子侄通經博史，成為官員，然後繼續代代相傳。

二、遍地烽火：朝鮮王朝的藏書與戰爭

有明 276 年，自太祖（1328-1398）、成祖（1360-1424）以降，四出求書，藏諸禁中。仁宣右文，訪求遺書，歲積代累，近百萬卷之規模。惜乎 1644 年李自成（1606-1645）入京，二百餘年的努力付之一炬。⁸²累積藏書是以百年計的文化事業，而毀滅往往只在轉瞬之間。1592-1598 年，朝鮮遭遇壬辰戰爭，恰逢建國二百年。經此大役已是不幸之至，卻又很快地在明清鼎革的變局重跌一跤，再逢書厄。⁸³

壬辰戰爭後的朝鮮，百廢待舉，滿目瘡痍。慶尚道、忠清道、全羅道並稱三南，乃朝廷財政根本，卻是為禍熾烈之地。朝鮮官方在戰前掌握的土地約 150 萬結，戰後僅存 30 萬結。⁸⁴光海君執政期間（1608-1623），立定 54 萬結為稅基，此後緩慢成長，等於經濟重新發展一次。朝鮮在戰爭中喪失 200 萬左右的人口，每 5-6 人便有一人物故，約佔總數的 20%，按照當時的人口成

⁸⁰ 申靖夏，《恕菴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卷 12，〈題家藏論語舊本〉，頁 389。

⁸¹ 黃梓撰，河炫朱（하현주）譯，《국역 경오연행록》（首爾：세종대왕기념사업회，2015），頁 26。

⁸² [明]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26，〈黃氏千頃齋藏書記〉，頁 339。

⁸³ 關於朝鮮官方在壬辰戰爭之後的書籍搜集與出版，請參閱丸龜金作，〈朝鮮宣祖末年之書籍蒐集と印出〉，收入稻葉博士還曆紀念會編，《稻葉博士還曆紀念滿鮮史論叢》（京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38），頁 617-651。

⁸⁴ 稻穀產 10 把為 1 束，10 束為 1 負，100 負為 1 結。1 結即能夠生產 1 結穀物的土地面積。關於朝鮮王朝的田結制度，請參閱徐榮輔、沈象奎編，《萬機要覽・財用編》，〈田結〉，頁 197-210。

長基數計算，費時 60-100 年方能回到戰前的水準。⁸⁵朝鮮官員李恒福（1556-1618）表示「人口則比平時僅十分之一，田結則不及平時全羅一道」，收拾全國收穫，難迄盛世一地所得。⁸⁶社會底層流失大量勞動力，宮闕殿閣惟存殘瓦碎礫，不復從前。

事實上書籍散佚的影響在戰間期已露出端倪。朝鮮以科舉取士，式年文科會講四書三經，然兵火之餘，百無存一。壬辰戰爭後第三年（1595），「士子之得有經書者，絕無而僅有」，讀書人無經書科年，朝廷在非常時期只好權宜應對，允許「只講一經一書」。⁸⁷圖書的消亡不分漢籍或東本，宣祖特令弘文館抽出館藏的東國書冊，別置西路地方，「若書冊盡失，則無以考我國久遠之事」。⁸⁸務必保存整個國家的記憶。

朝鮮歷來向中國求購漢籍，赴燕使行進書獻冊之例不勝枚舉。然而梳理朝鮮對漢籍的需求至此，方能明白柳根（1549-1627）在壬辰戰爭之後上〈進書籍疏〉的脈絡，⁸⁹以及 1598 年兵亂之後，朝鮮使臣越境訪書的意義。1599 年，李好閔（1553-1634）擔任冬至副使入燕，他知道宣祖經筵進講的書冊卷帙不全，遂廣求要緊書若干，又與書狀官商量，動用使節團公費，貿來漢籍 75 本。宣祖稱道李好閔的忠愛之誠，嘉悅不已。⁹⁰正是在此特殊時期，求冊歸國等同忠誠，在朝堂上議論進書之事，成為急務。

⁸⁵ 數據整理自桂勝範（계승범），〈兩場戰爭：明清之交的朝鮮王朝國家正體性問題研究〉，收入陳尚勝主編，《山大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輯 1，頁 241-258。

⁸⁶ 李裕元，《林下筆記》（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筆寫本），冊 19，卷 23，〈國用之縮〉，無頁碼。

⁸⁷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丁卯條，頁 34b-35a。另關於朝鮮知識階層注重四書三經，與中國的四書五經不同，其緣由與影響參陳亦伶，〈從「四書五經」到「四書三經」——對韓國經學研究的影響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4：1（2014），頁 55-72。

⁸⁸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己亥條，頁 21b。

⁸⁹ 柳根，《西垞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卷 8，〈進書籍疏〉，頁 530-531。

⁹⁰ 李好閔上劄曰：「臣先侍經幄，伏見經筵進講書冊皆經賊手，卷帙不全，不合清燕之覽，在玉河館日，廣求要緊書若干帙。而官本之書，市肆間罕存。適有以四書、四經、《君臣圖鑑》等冊來示者，臣與書狀官安宗祿相議，收拾盤纏剝數而換之。《詩》、《書》、《易》、《禮》、《論》、《孟》、《庸》、《學》、《庸學或問》、《君臣圖鑑》，總七十五本。謹昧死投進。」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三十三年六月七日戊寅條，頁 3a-b。

然而漢籍的恢復速度甚為緩慢，畢竟戰亂連年，全境遇敵。⁹¹1783年，曾任職奎章閣的徐浩修（1736-1799）充滿自信地表示：「閣臣之責，無大於稽古，而稽古之力，實藉於儲書。」⁹²可謂底氣十足。不過弘文館副提學吳億齡（1552-1618）在1600年，僅能無奈地承認「館中書籍亦多欠缺，我國已行之規，更無可考之地」。⁹³書籍、實錄、史草、日記皆入灰燼，誠非諱詞。⁹⁴直到1611年，朝鮮宮廷裡頭尚且湊不出一套完整的《大明會典》。⁹⁵校書館的銅活字蕩失無存，待亂後二十年（1618）方得重鑄。⁹⁶

各種知識的消失帶給社會一場場的混亂。百姓上公堂訴訟之際，上下之儀因無《經國大典》可考，不知所措。⁹⁷亂後第四年（1602），禮曹以書冊不備為由，再次提議科考由三經改為一經。⁹⁸武舉亦然，兵書如《黃石公》、《吳子》之類不可多得。⁹⁹亂後第六年（1604），成均館、禮曹向宣祖坦言新學士子，雖有志講讀，實無書可讀，閭閻間無從覓得一冊《詩傳》。¹⁰⁰

當習以為常轉頭空，不僅原本擅於講經論道的儒臣沒了法子，那些鎮日與草藥為鄰的醫生也束手無策。朝鮮內醫院上書朝鮮國王，表示「經變以後，內局方書，蕩失無餘。非徒議藥之際，考閱無據，新學之徒，無所取質，

⁹¹ 如金時讓（1581-1643）云：「壬辰之亂，賊兵瀰漫，殺戮不可紀極。深山窮谷亦不得免，無一寸乾淨地。」見金時讓，《荷潭金時讓文集》（首爾：《荷潭金時讓文集》발간추진위원회，2001），頁618。

⁹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正祖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甲戌條，頁85a。

⁹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己亥條，頁19b。

⁹⁴ 《東史約》載：「弘文館書籍實錄，史草日記皆入灰燼。」見李源益，《東史約》（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89），上冊，卷18，〈本朝紀·壬辰〉，頁767。

⁹⁵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三年四月十二日辛巳條，頁94b。

⁹⁶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十年七月二十二日戊申條，頁153。

⁹⁷ 徐涓（1558-1631）云：「各邑《大典》，盡皆遺失，故至於詞訟之間，上下之儀，亦皆不知，極為苟簡。」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癸未條，頁7b。

⁹⁸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三十五年十一月六日癸亥條，頁2a-b。

⁹⁹ 許箴云：「近日方試兵書，如《黃石公》、《吳子》之類亦不可多得。」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庚午條，11b。

¹⁰⁰ 朝鮮禮曹云：「經亂後，書籍蕩失，新學士子雖有講讀之志，亦無所伸。成均館乃士子藏修首善之地，所當汲汲收聚，以資講閱，所不可已，依本館牒呈施行。至於《詩傳》，則閭閻間絕無。至於會講，士子卷卷借讀。」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日丁未條，2a-b。

終不免孤陋之患」。¹⁰¹他們商議藥方時無所依據，新進學徒學習本草知識時也無所憑藉。

朝鮮史研究以壬辰戰爭為界，將朝鮮史分為前後兩期，此種認識同樣適用於朝鮮的藏書情形與書籍政策。研究者若不明瞭 16、17 世紀的戰爭帶給朝鮮哪些影響，實無從論起清代中朝書籍貿易的課題。壬辰戰爭後，皇太極（1592-1643）兩次入侵朝鮮，書厄再臨。弘文館的藏書「再經變亂，散失無餘」，唯一的補救辦法如同過往，「自今每於使臣赴京之行，購來書冊之切要者宜矣」。¹⁰²圖書故籍的消亡，召來朝鮮更積極的書籍貿易政策。朝鮮君臣在戰火中重建知識秩序，透過源自中國的漢籍，拾回時光的破片。

本節至此簡要梳理朝鮮王朝的知識世界、漢學素養、身分制度與出版條件，如何影響古代的朝鮮人需求漢籍。以下綜論近代東亞知識人因著外交使命而生的漢籍需求，而朝鮮同樣身預其中。

三、國際外交與漢學素養

古代東亞各國往來，語言是不可避免的難題。約莫隋唐時代以降，環東亞海域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冊封體系。這個講究上下、尊卑與主從關係的制度，不僅確立漢文是當外交場合的正式語言，更重要的是溝通彼此的文書中，舉凡年號、稱謂、用印、抬頭、缺字、紙張，乃至行文用語，皆有定律，¹⁰³稍一不慎便可能引起嚴重的後果。朝鮮、日本、琉球為免失誤，培養數個世代的漢學菁英，除本文前述的朝鮮兩班之外，日本的五山禪僧、江戶儒者，他們在國內是士人、官員，出境則負外交任務。

洪武七年（1374），足利義滿派遣使節前往中國，明廷以未帶表文為由拒絕來貢。明廷與朝鮮也曾因表箋問題，發生國際糾紛，洪武帝（1328-1398）甚至表示不介意敲響戰鼓，遍地烽火。¹⁰⁴朝鮮通信使與江戶朝廷的摩擦，屢次

¹⁰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辛巳條，頁 9b-10a。

¹⁰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仁祖七年六月十六日己巳條，頁 38a。

¹⁰³ 田中健夫，《前近代の国際交流と外交文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頁 1-42。

¹⁰⁴ 末松保和，《高麗朝史と朝鮮朝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頁 124-291，特別

源於國書避諱問題。1711 年，朝鮮派出通信使，慶賀德川家宣繼任幕府將軍。雙方的外交人員就國書避諱之事僵持不下，畢竟「書式，禮之所關最大」，朝鮮通信使面對改易國書的要求，放下「使臣雖死，不可持此國書出門外一步地」的狠話，日方則報以「使道雖不畏死，失歡拜盟之後，兩國無辜生靈，將入於塗炭」的威脅。¹⁰⁵茲事體大，各國官方豈能輕忽。

關於東亞各國與傳統中國的事大文書往來，牽涉層面廣泛，難以盡述。以下簡論琉球、日本、朝鮮為此的知識準備，說明他們遭遇的困難，以及如何產生漢籍的需要。

從洪武五年（1372）起，琉球定期兩年一次朝貢中國。兩國邦交一直維持到清代晚期，因日本併吞琉球（1879）方才告終。因為無表文則無法完成朝貢使命，而製作表文「必有一定體裁，確不可易」。¹⁰⁶表文氣象，務要冠冕堂皇、昌明博大，撰寫者需要「上稽典謨，下通詔誥、五經、史鑑、諸子百家精貫融會」。表文的對句用字極為考究，如天文地理、君道人事、朝代姓名，各依門類對偶。研習表文格式，學生須先錄此前表文數十篇，朝夕誦讀，平日則泛覽四書五經、《通鑑綱目》、《文獻通考》、《淵鑑類函》、《佩文韻府》各部大書。

琉球進貢表文的執筆任務，幾乎由久米村（於今那霸市）的儒者擔任。當地與中國華南地區交流密切，不乏先世為漢人出身。琉球同時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名為官生。每任國王派遣官生一次，一次 3-4 人，前往北京國子監求學。另有人自發前往福州留學，吸收中國的曆法、科律等知識。¹⁰⁷1798 年，琉球王府在首里設立學系，教授四書五經，提高學員的漢字讀寫能力。¹⁰⁸出身

是頁 220-229 為詳；朴元燾（박원호），《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2002），頁 33-63；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會，2015），頁 28-44。

¹⁰⁵ 任守幹，《東槎日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冊 3，頁 193-194。

¹⁰⁶ [清]趙登捷編，《擬表》（米澤：市立米澤圖書館藏寫本），卷 1，〈表文法式〉，無頁碼。本段關於琉球人撰寫表文的引文，俱出自卷 1，不另註釋。另，關於琉球表文的體例格式的轉變，見王尊龍，〈近世琉球における学知の構造転換—明・清皇帝への表文を手がかりに—〉，《史苑》，83：2（2023），頁 5-36。

¹⁰⁷ 淺野誠，《沖繩県教育史》（京都：思文閣，1991），頁 79。

¹⁰⁸ 淺野誠，《沖繩県教育史》，頁 117。

那霸士族的阿嘉直識（1712-1784），在他 58 歲時，撰寫一封《遺言書》給 6 歲的兒子，頗能呈現琉球知識人對漢學素養的追求。他提醒 15-25 歲，當學習中國書籍，特別以《小學》、《四書》、《六論衍義》為主，兼及其他儒典。他還表示除了日本的學問，務求專心於漢學與各類文書的格式。¹⁰⁹

日本自足利氏統領桑域後，「中華贈答，書簡使禪林之徒作之」。¹¹⁰江戶時代則部分由林家主持，部分仰賴以酌庵的禪僧。¹¹¹儒學的古典訓練造就不少江戶時代的政治家與外交官。德川家宣（1662-1712）、德川家繼（1709-1716）倚賴的重臣新井白石（1657）自幼誦讀《小學》、《四書》、《五經》，及長後仍不時涉獵經史，充實學問。¹¹²新井白石 32 歲時，為時任甲府藩主的德川家宣講授《大學》，爾後繼講《書經》、《資治通鑑》、《通鑑綱目》、《春秋》、《周易》。¹¹³豐厚的漢學素養是新井白石獲得海外知識的管道，從其《采覽異言》、《西洋紀聞》等著作可知，他掌握《元史》、《明史》、《西使記》、《瀛涯勝覽》數種漢籍，¹¹⁴為了準備與朝鮮通信使交流，又大量參閱《海東諸國紀》、《懲毖錄》諸書。¹¹⁵

對於日本儒者而言，中國歷代正史不啻窮盡世界歷史的秘笈。例如《明史》的〈朝鮮傳〉等同一部朝鮮通史，而中國歷代皇帝的對外政策，舉凡片板不得下海的禁令、鄭和下西洋的偉業、漳州月港出洋的措施，皆有資於遠邦異域的朝廷制定外交對策。漢籍不僅是通向儒學成聖之道的指引，同時也是讀書人吸收世界知識的不二法門。在外交辭令的戰場上，動輒被徵引的漢

¹⁰⁹ 阿嘉直識，〈阿嘉直識遺言書〉，收入東恩納寬惇，《東恩納寬惇全集》（東京：第一書房，1978），冊 5，頁 427。關於琉球知識人學習漢籍的程度，另請參閱水上雅晴，〈琉球地方士人漢籍學習の実態〉，《琉球大学教育学部》，84（2014），頁 1-12；水上雅晴，〈琉球中央士族の漢籍學習について〉，《沖縄文化研究》，41（2015），頁 53-98。

¹¹⁰ 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卷 12，〈外國書上・遣大明國〉，頁 4a。關於禪僧的外交職能，另請參閱西尾賢隆，《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禪僧》（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 190-210；池內敏，《絶海の碩学：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頁 1-19。

¹¹¹ 池內敏，《絶海の碩学》，第 2-4 章。

¹¹² 新井白石著，周一良譯，《折焚材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48、56。

¹¹³ 新井白石，《折焚材記》，頁 60-61。

¹¹⁴ 宮崎道生，《新井白石の洋学と海外知識》（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頁 242-258。

¹¹⁵ 宮崎道生，《新井白石の洋学と海外知識》，頁 295-327。

籍化身為以博學為名的刃器，如 1710 年時，新井白石面對朝鮮通信使一行，盡顯掌握《萬國全圖》、《月令廣義》、《圖書編》的知識優勢，朝鮮客人只得羞赧道「吾邦無此書矣」。¹¹⁶倘若新井白石手邊無從覓得漢籍參考，想必這將是另一番景象。

朝鮮方面，早在建國之初，朝鮮官員便表示：「我國家世事中國，言語文字，不可不習。」朝鮮官方設立司譯院，旨在「俾習中國言語、音訓、文字、體式，上以盡事大之誠，下以期易俗之効」。¹¹⁷嘉靖十八年（1539），朝鮮官員崔世珍（1468-1542）完成《吏文輯覽》，該書旨在教導朝鮮人閱讀、撰寫符合明朝標準的公文書。《吏文輯覽》的凡例揭示，朝鮮官員學習明朝的公文書，必須涉獵中國的官制、地名、律文，熟悉奏、咨、申、呈、劄、付等文移體式。¹¹⁸朝鮮人終究不生長於中國，特別是文言分離，口說語言與書寫語言不同，掌握漢學的難度自然較諸中國人更高。

《吏文輯覽》收錄上百條明朝公文用語，並逐條釋義，如「呈乞施行」的意思是將上件之語，呈於某官，而請乞施行也。¹¹⁹「案候」則指成立文案，待候差人之來。¹²⁰「分巡分守」，分巡謂御史及按察使，分守謂都司及布政使司。那怕當代經過文言文訓練的讀者，也得思量斟酌，方能解意，遑論數百年前的朝鮮士人。

朝鮮官方實施若干政策，維繫事大文書的品質。朝鮮世宗年間（1418-1450），凡干事大文書有誤者，雖一字半畫，皆決杖不贖，¹²¹懲罰嚴厲。因為事大文書乃至重之書，規定書成後需要三次檢閱，務必萬無一失。¹²²李好閔（1553-1634）曾執筆表文，從他的自白可明此間辛勞，他自道：「文書日日雲委，回咨之際必須查驗原卷，庶免違錯。」¹²³主掌表文者，勢必需要經驗累

¹¹⁶ 任守幹，《東槎日記》，冊 3，頁 199。

¹¹⁷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祖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乙卯條，頁 17a-b。

¹¹⁸ 崔世珍，《吏文輯覽》，收入前間恭作遺稿，末松保和編纂，《訓讀吏文附吏文輯覽》（京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42），頁 315。

¹¹⁹ 崔世珍，《吏文輯覽》，頁 318。

¹²⁰ 崔世珍，《吏文輯覽》，頁 342。

¹²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十二年六月九日壬子條，頁 4a。

¹²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中宗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丙申條，頁 13a。

¹²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宗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丁丑條，頁 39b。

積，是以朝廷規定相關人等不可輕易遞代，立久任之法。¹²⁴朝鮮君臣關心事大文書的程度，甚至到注意紙張的地步，朝鮮國王曾責罰造紙署的官員，因為「事大文書紙箭，專不用心製造」。¹²⁵

東亞各國因應外交需求的種種努力，促進各國搜集漢籍的行動，以及致力提高漢學素養。古代東亞國際關係的通行「語言」，顯然對於中國周邊國家形成一股學習中國知識的壓力，朝鮮正是同樣處於此般脈絡下產生漢籍需求。

四、結論

朝鮮奎章閣檢書官李德懋曾云：「中國書籍之稍稀貴者，除非文士入燕親購，則元無可得之理。」¹²⁶但銜命出使中國，絕非人人皆得為之的機遇。朝鮮士人，乃至朝鮮官方如此艱辛、長期向中國求取書籍的動力，此前一種常見的解釋是仰慕中國，或者中華文化，簡稱「慕華」。慕華確實曾經存在於東亞各國，事例不鮮。然而單從慕華的角度，難以說明外邦人何以持續索求漢籍上千年，甚至不惜違反中國法令。畢竟朝鮮知識人立場迥異，並非鐵板一塊。事實是傳統中國在制度設計上的早熟，成為後進者模仿學習的對象。周邊地區的知識菁英如朝鮮人，基於種種統治技術的參考，以及政治、身分制度衍生出對中國書籍的依賴性，形成對於漢籍的穩定需求。

將目光投向朝鮮士人的養成訓練、統治需要，慕華不是他們的主要關懷，如正文所述，大部分的議論甚至從來沒有考慮過慕華。傳統中國的皇帝制度、官僚制度、賦稅制度，不啻一系列調度人力、物資，確立名分階級的規範。傳統中國的周邊國家，確實曾出於學習的需要，陸續建立吸收中國知識的體制。然而他們著眼的是自己，為建設國家努力，而非中國。

本文綜論朝鮮人各種關乎知識的「制度建設」，並說明推動建立制度的動力，藉此還原以漢籍為中心的知識，在不同社會、時空脈絡中的地位與特

¹²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文宗元年七月三日己亥條，頁29b。

¹²⁵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十二年四月五日乙巳條，頁33a。

¹²⁶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上冊，卷19，〈金直齋〉，頁253。

色。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分析「知識」如何被形塑，不僅能夠呈現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更有助於解釋朝鮮人何以不斷學習、維持乃至於精進知識。倘若研究者僅僅參考朝鮮燕行使的日記，自然容易判斷他們愛書如癡，雅好中華文化。這種過分片面、單調的理解，完全忽略朝鮮內部的複雜背景。

論及朝鮮人求索書籍的行動，至少必須考慮到朝鮮知識人的養成、兩班身分制度、國家壟斷出版業，以及突如其來的戰爭摧毀大量漢籍。特別是朝鮮民間出版業，發展遲滯，直到 19 世紀初，仍不存在堪比明清中國、江戶日本的出版市場。因為朝鮮官方壟斷出版權力，並以活銅字刊刻書籍，然而該國本身卻不產銅，只能倚靠日本洋銅，民間不具備友善且資源充沛的出版條件。另一方面，相較於同時期的中國、日本，¹²⁷理應在出版事業扮演重要角色的兩班士族，不僅無意經營民間坊刻，或是鬻書販冊，他們在朝堂之上甚至拒絕由官方成立書肆，以廣知識流傳。由此觀之，朝鮮使者的購書旅行，不啻壟斷知識特權的行為，兩班士人賴此維繫自身家族知識、地位的傳承。

日本同樣存在獨佔漢籍、知識的階層，如中世的博士、五山禪僧，近世的儒者、武士。事實上，直到江戶時代以前，日本設立「施行」制度，非經朝廷允許，即便是博士家也不得閱讀、宣講漢籍，保障特權階層壟斷中國知識。儘管制度實施狀況不一，仍持續存在。文應元年（1260），藤原師繼（1222-1281）購買《太平御覽》時，便云該書「雖為未被施行之書，近年人翫之」。直到慶長八年（1603），林羅山（1583-1657）私自公開講授《論語集註》，雖有人向德川家康（1542-1616）攻訐林氏，云「自古講書者，皆有敕許」，卻未獲罪，施行制度方才正式告終。¹²⁸

即便朝鮮與日本的歷史上，同樣曾經出現獨佔漢籍的階層，兩者的身分制度亦存在差異。倘若將朝鮮比喻為文人的世界，江戶日本則可稱作武士的國度。江戶時代的儒者與明清、朝鮮士人一樣誦讀四書五經，研習經史子集，內中涵義卻截然不同。中國、朝鮮的讀書人修習儒典，目標是舉業上榜，入

¹²⁷ 中國方面的討論請參閱：周啟榮著，張志強等譯，《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 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第三章。日本詳後。

¹²⁸ 相關析論請參太田晶二郎，〈漢籍の「施行」〉，《日本學士院紀要》，7：3（1949），頁 199-207。

仕朝廷。江戶時代則是身分世襲的社會，不存在中國式的科舉制度。江戶儒學固然發生一系列的變化與進展，儒學的教養、知識亦不斷浸透武士階層，這均不代表制度上保障儒者參與政治。¹²⁹所謂的江戶儒者，不特指傳統中國或朝鮮王朝的士大夫，而是具備儒學知識的人，除了武士，他們也可能是醫生、商人乃至農民。

然而日本與朝鮮不同的是，從江戶時代開始，益發蓬勃的民間出版業，以及各層級的教育機構，造就越來越多的知識菁英，他們甚至能夠擔任藩學教授，改變階級。更重要的是，德川和平（Pax Tokugawa）治下兩百餘年，日本具備健全的出版市場，顯著提高壟斷漢籍知識的成本。寬永（1624-1645）以降，寺院之外的出版業逐漸增加。元祿年間（1688-1704），京都已有七、八十間書店，江戶的出版盛況甚至在十八世紀中葉，超越京都、大阪。出版量也迎來爆炸性增長，從寬文到元祿年間，增加 86%。1659 年《新板書籍目錄》記載 1600 種新刊書，1685 年《本朝雕刻廣益書籍目錄》6,100 種，1692 年更達到 7,300 種，¹³⁰其中漢詩文相關書籍成長幅度最高，解決日本知識階層的需求，¹³¹越來越多的讀者能夠接觸漢籍。

不過江戶時代的日本人，無法像朝鮮人般親赴中國，踏足遼東、北京，訪求書籍。寬文九年（1669）十一月十一日，幕府御用儒者林鵞峰（1618-1680）感嘆，近年中國商船不載書籍來，即便偶有書，價格高昂，況且加賀藩主前

¹²⁹ 關於近代東亞知識人的比較分析，請參閱：渡邊浩，〈儒者・讀書人・兩班—儒學的「教養人」存在形態—〉，收入渡邊浩著，《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6），頁 115-145；姜智恩，〈十七世紀儒者世界の様相〉，收入姜智恩著，《朝鮮儒学史の再定位》（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7），頁 35-85；宮嶋博史，〈東洋視角下的世族文化——韓中日三國世族之比較〉，收入韓國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王楠、安正燾譯，《朝鮮兩班的一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頁 1-18。

¹³⁰ 橫田冬彦，《天下泰平》（東京：講談社，2002），頁 342；辻本雅史，〈文字社會的成立與出版媒體〉，收入辻本雅史著，張崑將、田世民譯，《日本德川時代教育思想與媒體》（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127-148。

¹³¹ 從寬文到元祿年間，儒學書的出版量增加 44%，漢詩文的出版量則增加 92%。數據見橫田冬彦，《天下泰平》，頁 342。關於江戶時代和刻本漢籍出版狀況，請參閱長澤規矩也、長澤孝三編，《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增補補正版》（東京：汲古書院，2006）。

田綱紀（1643-1724）雅好漢籍，購書不論價，導致鷺峰一書難求。¹³²當時林鷺峰正在編纂日本國史《本朝通鑑》，為完成史事，經年累月地收羅天下圖書。晚近的研究時常稱美中日書籍往來如何頻繁密切，揆諸清廷實施海禁政策期間（1655-1683），日本讀書人求書不易。

本文重建朝鮮人的漢學素養，以及天災人禍如何催生漢籍需求。特別論及該國有別於日本，存在諸如官方壟斷出版權力、兩班士族企圖維持身分地位、知識人不投身出版事業等因素，形成明清時期朝鮮求書的背景與緣由。筆者認為，深刻描繪向中國求取書籍的人，方能說明他們面對種種限制與挑戰，何以不懈努力，直至功成之日方休。至於此種強烈的漢籍需求與中國管制的碰撞，如何形成漢籍廣泛流通東亞的歷史現象，有待後續深入研究。

本文於 2023 年 10 月 4 日收稿；2023 年 12 月 11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江昱緯

¹³² 林鷺峰，《國史館日錄》（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昌平坂學問所藏寫本），寬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無頁碼。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錢謙益，《牧齋有學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趙登捷編，《擬表》，米澤：市立米澤圖書館藏寫本。
- 〔清〕趙翼，《浦渚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85，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
- 申靖夏，《怨菴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197，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
- 任守幹，《東槎日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 李沂，《海鶴遺書》，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74。
- 李晬光，《芝峰類說》，柏克萊：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二年（1614）序刊本。
- 李植，《澤堂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88，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
- 李源益，《東史約》，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89-1990。
- 李裕元，《林下筆記》，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筆寫本。
-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首爾：首爾大學校古典刊行會，1966。
- 林鷺峰，《國史館日錄》，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昌平坂學問所藏寫本。
- 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寬文二年（1662）刻本。
- 金時讓，《荷潭金時讓文集》，首爾：《荷潭金時讓文集》발간추진위원회，2001。
- 金壽興，《退憂堂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127，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4。
- 阿嘉直識，〈阿嘉直識遺言書〉，收入東恩納寬惇，《東恩納寬惇全集》，冊 5，東京：第一書房，1978，頁 425-438。
- 柳希春，《眉巖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34，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 柳根，《西垞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57，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 柳馨遠，《磻溪隨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58。

首爾大學校奎章閣編，《英祖御製訓書》，收入《奎章閣資料叢書・儒學篇》，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03。

孫曉主編，《高麗史標點校勘本》，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徐榮輔、沈象奎編，《萬機要覽・財用編》，京城：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37。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61-1977。

崔世珍，《吏文輯覽》，收入前問恭作遺稿，末松保和編纂，《訓讀吏文附吏文輯覽》，京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42。

朝鮮正祖命編，《度支志》，收入《奎章閣資料叢書・官署志篇》，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05。

黃梓（황재）撰，河炫朱（하현주）譯，《국역 경오연행록》，首爾：세종대왕기념사업회，2015。

黃梓（황재）撰，신로사譯，《국역 갑인연행록》，首爾：세종대왕기념사업회，2015。

黃德吉，《下廬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260，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

新井白石著，周一良譯，《折焚材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鮮于浹，《遜菴全書》，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93，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

二、近人論著

丸龜金作，〈朝鮮宣祖末年の書籍蒐集と印出〉，收入稻葉博士還曆紀念會編，《稻葉博士還曆紀念滿鮮史論叢》，京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38，頁 617-651。

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6。

山内弘一，〈朴齊家に於ける「北學」慕華意識〉，《上智史學》，43（1998），頁 11-22。

山内弘一，〈朝鮮國人李德懋と慕華意識〉，《朝鮮文化研究》，7（2000），頁 25-45。

元裕漢（원유한），《朝鮮後期貨幣史研究》，首爾：韓國研究院，1975。

太田晶二郎，〈漢籍の「施行」〉，《日本學士院紀要》，7：3（1949），頁 199-207。

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

水上雅晴，〈琉球中央士族の漢籍學習について〉，《沖繩文化研究》，41（2015），頁

53-98。

水上雅晴，〈琉球地方士人漢籍學習の実態〉，《琉球大学教育学部》，84（2014），頁1-12。

王元周，〈朝鮮的清錢通用與革罷——宗藩體制下市場的整體性及其侷限〉，《南國學術》，10：1（2020），頁34-47。

王尊龍，〈近世琉球における学知の構造轉換—明・清皇帝への表文を手がかりに—〉，《史苑》，83：2（2023），頁5-36。

末松保和，《高麗朝史と朝鮮朝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

田中健夫，《前近代の国際交流と外交文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

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

向卿，《江戸時代日本人身份建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朱莉麗，《明日交渉與日本對華觀的流變》，濟南：齊魯書社，2021。

朴元煥（박원호），《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2002。

朴讚美（박찬미），〈17-18世紀朝鮮建立銅錢制度之研究〉，《史耘》，19（2021），頁81-136。

池內敏，《絶海の碩学：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

西尾賢隆，《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禅僧》，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辻本雅史著，張崑將、田世民譯，《日本德川時代的教育思想與媒體》，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吳政緯，〈明清官方書籍輸出制度研究〉，《文獻》，3（2023），頁42-72。

李光濤，〈記東國朝鮮之求書（上）〉，《大陸雜誌》，16：10（1958），頁5-8。

李光濤，《中韓民族與文化》，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8。

李成茂（이성무）著，楊秀芝譯，《朝鮮初期兩班研究》，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96。

李成茂（이성무），〈朝鮮時代的身分結構與特徵〉，收入朝鮮社會研究會編，游苾歆譯，《朝鮮王朝面面觀》，臺北：永望文化，2019，頁73-78。

李成茂（이성무），〈朝鮮時代的兩班文化〉，收入朝鮮社會研究會編，游苾歆譯，《朝鮮王朝面面觀》，臺北：永望文化，2019，頁149-156。

李胤錫（이윤석），《조선시대 상업출판：서민의 독서, 지식과 오락의 대중화》，

首爾：민속원，2016。

李碩崙（이석륜）著，藤田幸雄譯，《韓國貨幣金融史》，東京：白桃書房，2000。

沈慶昊（심경호），〈韓國における近世以前の出版文化と中国書籍の刊行方法〉，收入宮内庁書陵部藏漢籍研究会編，《圖書寮漢籍叢考》，東京：汲古書院，2018，頁 281-355。

季南，《朝鮮王朝與明清書籍交流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

周啟榮著，張志強等譯，《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 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

岸本美緒、宮嶋博史，《明清と李朝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林麻衣子，〈李氏朝鮮王朝における對外使節の出自について〉，《史泉》，89（1999），頁 16-24。

金重權（김중권），〈朝鮮朝 經筵에서 明宗의 讀書歷 考察〉，《書誌學研究》，49（2011），頁 77-109。

金重權（김중권），〈朝鮮朝 經筵에서 英祖의 讀書歷 考察〉，《書誌學研究》，79（2019），頁 56。

金程宇，《域外漢籍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

金榮鎮（김영진），〈18 세기말 서울의 명칭서적 유통 실태——『欽英』을 중심으로〉，收入이화여자대학교한국문화연구원編，《2004 년 한국문화연구원 학술대회 17・18 세기 동아시아의 독서문화와 문화변동》，首爾：이화여자대학교한국문화연구원，2004），頁 99-119。

金榮鎮（김영진），〈조선후기 중국 사행과 서책 문화〉，收入金泰俊（김태준）編，《연행의 사회사》，首爾：경기문화재단，2005，頁 237-290。

金榮鎮（김영진），〈조선후기 서적 출판과 유통에 관한 일고찰——『欽英』과 『頤齋亂藁』를 중심으로——〉，《동양한문학연구》，30（2010），頁 5-28。

金榮鎮（김영진），〈19 世紀朝、清文士之間的書籍受贈及對出版文化的影響〉，收入大韓民國教育部、韓國研究財團、中國社會科學院編，《제 1 회 한・중 인문학포럼 발표자료집》，대전：한국연구재단，2015，頁 88-100。

長澤規矩也、長澤孝三編，《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増補補正版》，東京：汲古書院，2006。

- 姜明官 (강명관), 〈조선후기 서적 수입 · 유통과 장서가의 출현〉, 《민족문화사 연구》, 9 (1996), 頁 171-194。
- 姜明官 (강명관), 《조선시대 책과 지식의 역사》, 首爾: 천년의상상, 2014。
- 姜智恩 (강지은), 《朝鮮儒學史의再定位》,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2017。
- 淺野誠, 《沖繩県の教育史》, 京都: 思文閣, 1991。
- 胡春惠, 〈從中韓關係史中談漢學之東漸〉, 《湖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8: 5 (2014), 頁 5-10。
- 宮崎市定, 〈書禁と禁書〉, 收入宮崎市定, 《アジア史研究》, 卷 2, 京都: 東洋史研究會, 1959, 頁 232-254。
- 孫衛國, 《從「尊明」到「奉清」: 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 1627-1910》, 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 2018。
- 孫衛國, 《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 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 (1637-1800)》(修訂版),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
- 宮崎道生, 《新井白石の洋學と海外知識》, 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73。
- 宮嶋博史, 〈朝鮮兩班社會の形成〉, 收入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宮嶋博史編, 《アジアから考える》, 冊 4,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4, 頁 131-164。
- 宮嶋博史, 〈東洋視角下的世族文化——韓中日三國世族之比較〉, 收入韓國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 王楠、安正燠譯, 《朝鮮兩班的一生》,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0, 頁 1-18。
- 島田竜登, 〈近世日本の銅輸出削減と朝鮮の錢荒〉, 收入川勝平太編, 《アジア太平洋經濟圈史: 1500-2000》, 東京: 藤原書店, 2003, 頁 27-46。
- 桂勝範 (계승범), 〈兩場戰爭: 明清之交的朝鮮王朝國家正體性問題研究〉, 收入陳尚勝主編, 《山大史學》, 輯 1,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0, 頁 241-258。
- 康吉秀 (강길수), 〈朝鮮時代의 教育古典〉, 收入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教育研究室編, 《韓國의 教育古典研究》, 城南: 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 1983, 頁 79-130。
- 陳正宏, 《東亞漢籍版本學初探》, 上海: 中西書局, 2014。
- 陳亦伶, 〈從「四書五經」到「四書三經」——對韓國經學研究的影響與展望〉,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24: 1 (2014), 頁 55-72。
- 渡邊浩, 《東アジアの王權と思想》,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2016。

黃智瑛 (황지영), 《명청출판과 조선전파》, 파주: 시간의물레, 2012。

漆永祥, 〈朝鮮燕行使團中的正使、副使與書狀官研究〉, 《中國文化》, 56 (2022), 頁 203-223。

漆永祥, 〈朝鮮朝燕行使團中的譯官軍官與帶率子弟等研究〉, 《東疆學刊》, 40: 1 (2023), 頁 1-20。

橫田冬彦, 《天下泰平》, 東京: 講談社, 2002。

蔡茂松, 《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 臺北: 東大圖書, 1995。

鄭亨愚 (정형우), 〈書肆에 대한 몇 가지 問題〉, 收入斗筆鄭亨愚博士定年紀念論文集刊行委員會編, 《朝鮮朝書籍文化研究》, 首爾: 九美貿易株式會社出版部, 1995, 頁 381-432。

磯部彰編,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こはく》, 東京: 知泉書館, 2004。

磯部彰編,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にわたり》, 東京: 二玄社, 2004。

磯部彰編,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ほしづくよ》, 東京: 日本學術振興會, 2010。

韓東育, 《從「脫儒」到「脫亞」: 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 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 2012。

韓基彥 (한기연) 著, 井上義巳譯, 《韓國教育史》, 東京: 廣池學園出版部, 1965。

藤井倫明, 〈日本山崎闇齋學派的「中國／華夷」論探析〉,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23 (2015), 頁 193-230。

權惠永 (권덕영) 著, 樓正豪譯, 《古代韓中外交史: 遣唐使研究》, 臺北: 秀威資訊, 2022。

Brokaw, Cynthia, and Peter Kornicki, eds.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3.

Burke, Pete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McDermott, Joe P., and Peter Burke, eds. *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 1450-1850: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三、網路資源

大韓民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資料庫：

<https://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擷取日期 2023.5.1。

大韓民國國史編纂委員會韓國史資料庫：<https://db.history.go.kr/>，擷取日期 2023.5.8。

A Study of the Reasons Why Korean's Sought to Purchase Books from China during the Chosŏn Dynasty (1392-1910)

Wu, Cheng-wei*

As is well known, Korea, Japan, and Vietnam possess astonishingly voluminous collections of Chinese books that were printed in China. When tracing the processes and reasons why these countries sought out Chinese publications, many scholars have attributed this phenomenon to the mentality of *muhua*, that is, the admiration of China or Chinese culture by foreigners. *Muhua* was arguably one established aspect of the historical data, and there are examples of individuals who adhered to this idea in their collecting of Chinese books. However,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attitudes toward China were neither static nor unified and underwent a complex and lengthy series of changes.

In focusing on Chosŏ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why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Koreans living through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tinued to seek Chinese books. What drove the desire for Chinese books can be broadly categorized into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re were long-term factors such as the need to nurture knowledge, cultivate talent, design institutions, and improve the publishing environment; secondly there were unexpected events, especially wars; and thirdly, there were the practical needs each and every premodern East Asian country must face, specifically diplomatic exchanges with China, which required a certain level of sinological proficiency. In fleshing out these three aspects, this study will offer new perspectives beyond that of cultural admiration, to fost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ckground and reasons behind the pursuit of Chinese books in Chosŏn Korea.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eywords: Chinese Books, Sinological Literacy, Yangban, history of books,
history of knowledge